

从豪爽女人到豪爽左派

红辰

——回应「红笔」的〈披着兔皮的瘦弱老虎〉

台湾地区的女权运动，从早期的吕秀莲披荆斩棘，开疆辟土以来，虽然速度也许不是很快，但一直有很好的进展；不过九〇年代，有关性解放议题却被何春蕤等一小撮人吹绉一池春水，引起争议四起，批判不停。这其中最大的赢家，恐怕是何春蕤本人，因为她可能已经名利双收了。最大的输家，容我大胆地预测，将是盲目跟进想做『豪爽女人』，而奋勇跳入情欲大池，却不会游泳，也没有救生圈，而不幸惨遭灭顶的基层女子。

以上这段引言先肯定了「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改良主义」，然后再祭出饱受苦难煎熬，亟待拯救的「基层妇女」。这段引言又是出自哪位左派大师之口呢？

「性知识解严成为商品与运动工具」！

这段引言是一篇近六千字文章的开头。一九九五年三月十八日，中华民国性教育协会在师范大学召开会员大会及学术研讨会。这个中华民国性教育协会的背后主力就是标榜「性教育是发扬人性，支持美满家庭生活，并对自己之性行为负责的教育」的杏陵医学基金会。这天大会的上午有个座谈会，会中马偕医院的郑丞杰医师（经常和江汉声、谢瀛华、冯溶等医生出现在各种通俗媒体制造主流性论述的「名嘴」之一），以他在台湾医界联盟的《医望》杂志所发表的「豪爽性育」一文为参考材料（此文有个小标题「性知识解严成为商品与运动工具」，真是既批判了资本主义又批判了性解放，实在是不错的口号，可供「红笔」型作者参考一下）。然后郑丞杰用有点本土草根气味题目的一篇〈好坑斗相报？抑是诅咒乎别人死？〉长文作为他发言的骨干，并将此文当场在大会上散发。

郑丞杰的这篇长文印在B纸上正反两面，但却不显得密密麻麻，堪称美工设计精良，原来是他们情商报社协助印刷的。当场参加座谈的两三百人都

拿了一份。事实上，同一篇文章就在座谈会的前一天（三月十七日）全文刊载在该报的生活版上（座谈会上散发的文章上也注明了这一点）。

郑丞杰长文的开头就是本文开头所引用的文字。但是这究竟和「红笔」在立报三月三十日写的〈披着兔皮的瘦弱老虎〉有什么关系？

喔，有关系的，让我慢慢道来。

乡镇的低阶层妇女、工厂饱受剥削血汗斑斑的女工、被迫出卖肉体的原住民雏妓、新公园暗夜寻慰的同性恋、后段班无学历的建教生、衣索匹亚的饥民、日本大地震的灾民、波士尼亚战火下的难民……究竟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主义或××运动呢？目前中产知识份子的反抗运动或解放运动，究竟对他们有什么用？那些知识份子脑子里所产生的乌托邦，除了可能被当作文化商品促销或者被资本主义收编外，究竟在解决基层人民的具体处境上，有什么 正有效的、有物质基础的、全面认识论的实践策略？

这段引言看来颇为眼熟？当然，无病呻吟的东西原本都很相像（等下，我就会显示什么才不是「无病呻吟」的「有的放矢」）。这段话和郑丞杰为

基层妇女打抱不平的话其实相去不远，差别仅在于郑不熟悉左派语言，他也较少听到无病呻吟（找郑看病的，大多是真有病的，如果无病找郑呻吟，还要破费一笔）。（注：上段引言是我虚构的，若有雷同，纯属巧合。）

但是写写基层妇女、骂骂情欲商品化、被资本主义收编、运动中产化……等等，就是「左派」了吗？就是「（无产）阶级立场」了吗？如果是，那么郑承杰也就是左派了。（可是如果说郑是左派，郑一定会告此人诽谤）。

所以，红笔在文章中自承「左派」，一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模样，这还需要再深入分析一下，究竟红笔是哪一种左派。

情欲的现实和压迫与新的性保守派之兴起

先让我们继续来谈谈中华民国性教育协会，因为这涉及张娟芬所说的「女人退无可退的情欲现实」。左派不是向要从「现实」出发吗？所以让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列宁语）。

中华民国性教育协会的主要成员，既有学者也有医生，并且横跨所谓

「学术界」及通俗大众领域。数年来，他们在通俗媒体及各种场合四处演讲。在解严之后，他们公开谈性，对于打破禁忌是有功劳与贡献的；当时的性保守派仍然反对谈性说性，所以这些医生学者在这个阶段是属于「性自由派」，也就是自由主义派。可惜，他们之中的大部份缺乏自由主义真正的文化素养，社会也缺乏自由主义的社会文化传统，故而当旧保守派失去性论述场域中的霸权位置后，这些人中的一部份就转而变成性保守派，把大众不满「性现状」的性能量由冲破禁忌反对性压迫，转而变成巩固婚姻和一夫一妻家庭、巩固社会秩序等方向去。

这些新的性保守派不再采取禁制、压抑、阻止等权力施为，反而以驯训、纪律、鼓励等有积极或生产性效应的权力技术来运作，这正是《豪爽女人》的女性主义性解放立场所面对的（傅柯式）现实。这些新的性保守派言论也就形塑了《豪爽女人》介入之前的性论述空间。

现在中华民国性教育协会，除了原有的杏陵基金会、家庭生活与性教育中心，又以原班人马成立了「性林文化事业公司」，这批人是晏涵文、涂醒哲、冯榕、江汉声、谢瀛华、彭怀真等人，出版了号称国内第一本性教育

的大专教科书（国中性教育教材及高中中性教育教材则早已出版了）。并且也有《台湾性学学刊》，这个学术性期刊在今年三月创刊，同时也将在一九九六年七月召开亚洲性学会议，以国际连线来强化学术正当性（中港台三地的性教育组织则早已完成连线了）。

至于中华民国性教育协会的「官方」地位已十分稳固，现在就等待教育部的性教育全面正式实施（今年七月起将用「主题辅导周」模式推广性教育到中小学），他们就可以全面出掌性教育的大权了。我们的中小学生、大学生，我们的女生、同志学生、性异议学生，即将在正式的教育管道中遭受权力操作更细致、更权威，也更有说服力和公信力的性别歧视主义的、异性恋霸权的、性压迫的灌输洗脑式的意识形态教育。这就是女人与性少数目前退无可退的情欲现实之一。

当然，同样类似的状况，也发生在社会中各个角落、工人、原住民、残障等等子女也是正式教育中的受压迫者。但是就性激进派而言，目前这个情势是重要的时刻；某些女性主义者、同性恋及其他性异议分子、激进青少年及民主教育者关心目前性教育的发展，认为这也许是个有机会介入干预的时

刻，可以对未来女性及性少数生存空间有影响的战场。

「红笔」型「左派」不能面对情欲的现实问题

面对这样的现实局面，左派的立场是什么呢？什么是无产阶级、基层妇女的性教育呢？现在性教育的教材有什么错误？应如何批判？另类的性教育内容应当是什么？这场性教育的斗争应采取什么方式进行（学术的？体制外的？）女性主义者与同性恋及教育改革者合作的策略是什么？等等这一连串问题才是红笔型的「左派」应当作出讨论与回答的，这才是有的放矢，而非无病呻吟。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唯有针对被压迫者主体经验到的现实问题，作出分析、回答、讨论才会帮助被压迫的人反抗，才会扩张反抗的形式（使之串连到阶级），扩大社运团结的形式（使女性主义、同性恋解放等与左派串连）。

摆出左派架势的红笔，就请你针对上述这些问题做出左派立场的回应吧！「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伊索寓言中有个说大话的人，

硬说自己曾在罗陀斯岛跳得很远很远。马克思最喜欢用的典故之一，转义为「就在这里证明你自己吧！」。）

当然，情欲弱勢者（女人、老人、青少年）与情欲边缘者（同性恋、豪爽女人及其他性少数）所面对的压迫现实绝不只性教育这个问题，除了日常情欲生活的被剥夺、歧视、抹黑，物质经济的阶层分化、政治社会文化权力不平等問題（这些就是她们退无可退的情欲现实），还有一个急迫的性革命问题，而性教育的变革只是这个正在改变情欲现实的性革命的部份。而这场性革命原来是由资产阶级男人异性恋、自由主义及保守的开明派主导的（性学大师们则是这个革命的宣传部）。现在因为豪爽女人及同性恋的声音，有了干预及介入这场性革命的可能。左派如何面对这场性革命？有什么实践策略？等等，我们还可以再问一连串问题。（卡维波曾写过两篇谈性革命带来的性开放，可参考〈一场性革命正在发生〉以及〈性解放的政治〉，都收在本书中。何春蕤则写过〈豪爽女人——女性主义与性解放〉《妇女新知》，1994.10，149期，以及〈海蒂之前与海蒂之后——台湾性论述战场观察〉，《联合报》1994.11.10，读书人版，已收入本书中）。

可是我看红笔是无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她是没法在罗陀斯跳左派的情欲之舞的。

为什么我敢这样说呢？因为两个密切相关的原因。

第一，从红笔的文章来看，她对「性歧视主义」及「情欲沙文主义」不够敏感，也明显地对马克思主义的性激进传统无知。

第二，红笔的「左派」不但是一种无病呻吟式的，而且还是压迫式的、中央集权式的左派，和人民民主、边缘战斗式的左派刚好相反。这种集权左派是无能处理情欲问题的。

在这篇文章中，我只处理第一点，我将把第二点留待下篇文章再处理。以下让我来详谈红笔的性歧视主义。

性歧视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性激进派如何看情欲？

「性歧视主义」的中心就是「性基本上就是有问题、不好的、恶的、坏的、有负面效果或副作用的，必须要经过证明，才能说性在什么状况下是好的、没问题的。」套句法律用语，性歧视主义基本上就是：先假设「性」

有罪，必须自己证明本身无辜才行（sex is guilty until proven innocent）。性歧视主义因此会颠倒需要证明的次序。例如，青少年或基层女工从事很多性活动时，性歧视主义「直觉常识」地将之视为一种「问题」，要求证明那有什么「好」。但相反的，性歧视主义从来不质疑青少年或女工的禁欲生活是不是阶级支配的一部份，有什么恶果等等。

从这个对「性」疑惧的中心出发，性歧视主义也会把情欲当作一种奢侈品或附加价值，是个人私事而无社会意义，在婚姻框架内才有正当性的东西。

「性歧视」把情欲当作有闲阶级的享受（红笔认为弱势族群或阶级不搞情欲流窜的偷情，正如过去歧视同性恋的人，把同性恋当作中产文艺界的癖好一样），而非日常的物质需要，这就会产生很可笑的想法。例如，性歧视主义可能会把基层女工需要良好的工作环境及福利、法律的保障或促进、政治权力的参与及伸张、舒适的住屋、安全的交通、营养卫生的饮食、受尊敬的文化社会地位……等视为当然，但却不把高品质情欲生活当作对女工同样重要的物质需要。这就是性歧视主义在作祟。

这个作祟的性歧视主义，因此会把情欲人权看作比政经人权更次要的东西。进而就很容易和压迫式的、中央集权式的左派观念挂勾，认为「经济」或「政治」的运动才是根本的、主要的、现阶段应当主宰的等等。

情欲是日常的物质需要，并且和其他物质需要有密切关连，这是马克思主义性激进派的一贯主张。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在和唯心主义作斗争时，以物质主义观点去重新看「爱情」，而说「爱情是一种情欲」，他要强调的就是：「性」是物质的，而且是爱情的物质基础。这个观点几乎影响了所有的主要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鲁迅也认为性欲应当作为恋爱的基本条件。后来的 Reich 更视情欲需求是发展阶级意识所必须。

今天如果有人要和女性主义性解放者，或者其他的性激进派进行社运观点内部的对话，那么首先就应尝试着从被性压迫的主体位置出发，首先就应克服自己的情欲沙文主义（亦即认为只有自己的情欲模式是正常正确的，其他的模式像易装、变性、恋兽、恋物、SM、同性恋、跨代恋、婚外婚前性、滥交、公共场所交等都是不正常或不正确的）。

故而（正如美国的女性主义性解放者所说）「从今天起，我们要先预设

性是无辜的，除非能证明它有罪」。

那么，红笔的文章有没有性歧视主义的问题呢？

我看是有的，这可从两方面来看。一个是红笔整篇文章的立场，一个是红笔文章的文本。

红笔文章中的性歧视

在今天台湾，由性开放带来的更细致的性压迫，以及更有效地对性少数主体的收编及局限的权力技术下，性歧视主义仍然到处可见。豪爽女人的女性主义性解放运动才开始主体呼召，主体都还没有现身、组织起来。其他的性少数，除了同性恋有了非常弱势的组织及正当性外，都还没开始主体的呼召及现身。在这样的情况下，性解放运动不是需要一个更鼓励、更友善的社运空间吗？

按照道理说，左派人士应该对台湾情欲的现况、性压抑的现实持彻底否定的态度才对，可是看看红笔文章对「女性主义性解放」的严厉责备，彻底否定，不由得让人觉得她是对「性解放」、「性」有根本的疑惧，这不是性

歧视主义是什么？

我们能想像有左派会对刚刚进行主体呼召，而无组织力量或主体现身（例如）消费者运动、工人运动、环保运动等等进行这样的批判吗？如果一个运动有了正当性、有了组织、有了些力量，那么与之进行社运内部的批判并不是不可以。而且一个运动越是要和国家机器结合，越是占领领导其他社运的地位，越是有庞大资源的组织，就越必要接受最严厉的批判。可是我们不能像一些趋炎附势之徒一样，专门捧大的揍小的。（例如，女人在目前政治选举文化中并没有性别意识及性别自觉，难道还不该喊出「女人投女人的票」吗？号称「左派」或「妇运」的团体为何要反对这种口号呢？难道左派也反对「工人投工人的票」吗？）

从红笔的文章本身来看，也可看出她是有性歧视主义的。她说：

作为「社运观点的情欲对话」，张娟芬并没有告诉我们：就整体社会关系而言，「性」在其间展现了什么意义？何以豪爽女人这样形式的「性解放」是现在的妇运对既有性别权力关系的挑战中具颠覆力量的？在特定的分析里，或许有必要将性关系置于主轴，但就「社运观点」而言，

张娟芬却没有作出在这个前提之下，把性关系抽离或凌驾其他社会关系之上来诠释其与妇女解放和他种社运的关系之基础为何。它是怎样被提到社会改造的日程表上？

如果我们把这段文字的质疑对象，由「性」改成「阶级」，那么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原文的性歧视。事实上，我们很难想像有人会用同样的方式来质疑「阶级」在整体社会关系中有什麼意义，或质疑「阶级解放」是怎样被提到社会改造的日程表上——除非此人根本看轻或歧视被压迫的阶级主体。

其实女性主义的性解放，就和妇运中的政治、法律、文化、经济、社会等战线一样，只是其中的一种。对于性别关系中的性问题，应当和性别关系中的法律问题或阶级问题等一样同等地被对待，否则恐怕就是性歧视主义在作祟。

女性主义性解放不分阶级——性与阶级的关系

如果性主义的性解放运动能够起步，那么也自然会在运动过程中建构出其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的面向。

女性主义的性解放运动当然应当和工运或阶级运动连线，以克服性解放运动中可能有的阶级歧视与压迫，但是另一方面，女性主义性解放的反抗性压迫是不分阶级的，因为不论什么阶级的女人都遭受到性压迫。（女性解放一方面串连阶级运动以反对阶级压迫，另一方面又不分阶级的反性／别压迫，这并非自我矛盾。试想工运或阶级运动不也是一方面应当和妇运连线以反对性别歧视，另一方面也不分性别的反抗阶级压迫吗？）

至于情欲异议分子这种性少数——不管是豪爽女人或女同性恋，在各个阶级中都是存在的。因为在目前性压迫社会中，女人很少自愿选择进入性少数这种被强力压迫的位置，她们都是在个人生活及家庭史中因缘际会的产物（也就是何春蕤所谓的「独特性癖」）。这种类型性少数主体的形成和阶级位置没有关连。

可是，这不意味着阶级与性没有关系。不同的阶级有时会对同一性模式有相异的自我认同、感觉形式及表现方式。金赛在一九四〇年代的一万八千个样本中发现，不论是手淫、同性恋、口交、婚外或婚前性等，在男人之间有显着的阶级差异；不过金赛也指出，就女人而言，年龄和性别意识形态则

比较是显着因素，女人在性模式的表现上，阶级差异较不明显。后来的调查虽然发现阶级界限的逐渐泯灭，但不同阶级的性型式仍是继续存在的。

女性主义性解放的文化资源

红笔在文中还提到性解放的文化资源中，有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刊物、第一世界的性学书等等与本土乡镇有情欲内涵的客家山歌之区别。红笔误以为女性性解放在文化资源的选择上较看重前者而非后者。但是女性主义的性解放者没有必要做这种白痴选择吧。既然要推广运动，就当然要针对不同族群、阶级、年龄……女人的特性和共通性，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资源。如果城市小资产阶级女人喜欢附庸本土风潮来建立起其情欲的主体性，那就不妨唱首客家山歌给她们听。如果原住民女工喜欢马克思，那就从马克思主义观点谈情欲。

所以性解放的文化资源的选择方面，应当是「针对群众的特性，开创进步的共通性」，而不要自我设限；特别是要警醒，在资源选择时的性歧视主义、阶级歧视主义、年龄歧视主义……等等。例如，认为某些情欲文化资源

太露骨、太变态、太边缘、太不符合主流道德故而不适合群众，或者认为下层阶级的女人或老女人不能接受同性恋，或者认为家庭主妇不能接受不婚生子等等预设偏见，而这些偏见其实是建立在阶级、年龄、性别等方面的刻板印象。

我不敢说红笔在谈到情欲文化资源的选择时可能有潜在的性歧视主义，但是她接着又问：

是否对性说「是」，就代表对权力说「否」？种种借由性来作为交换媒介的异化（它们不一定只是金钱），或由性关系中展现的压迫，难道会因为两造同意且没有身体伤害，就得以消除吗？

这段话的问题在于，从来也没有任何性激进派甚至性自由派会认为，性可以解决一切权力问题，或者是消除一切压迫的基础。反而，有这种类型幻想的人往往是中央集权式的左派，认为阶级是消除一切压迫的共同基础。

性激进派是「天生」的人民民主派，绝不会认为对性说「是」，就自动代表着对其他权力形式说「否」；同样的，在妇女的任何一条战线上，不论是政治、经济、法律或文化的反支配，都不代表着对其他权力形式自动的否

定。一种反支配和其他种反支配的关系从来不是自动发生的。

我想如果红笔没有性歧视主义，而把「性」就当作任何其他社运的议题一样对待，那么她就不会去问那些性激进派从来没有假设过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的反性歧视态度

号称左派而心存性歧视主义及情欲沙文主义者，往往不熟悉马克思的性激进派传统，这个传统也深深影响了女性主义性解放这种性激进派。马克思主义性激进派的传统当然是始于马克思与恩格斯，他们就比较没有性歧视主义的毛病，这可由他们关于卖淫的论述看的出来。

卖淫，也就是刚才引用红笔文字中所谓的「借由性来作为交换媒介的异化」，常常被性歧视主义者视为罪大恶极之事，这是因为在性歧视主义的眼光中，平常的坏事若再和「性」沾上边，就会罪加一等。可是在马恩二人的眼里，资产阶级中，「妻子和普通娼妓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计件出卖劳动那样出租自己的肉体，而是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以及「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即正式和非正式的卖淫」。更有甚者，马克思

思根本就认为「卖淫只是劳工出卖自己的一种特定表现而已」，换句话说，人们上班、上工的行为就和卖淫一样，反之亦然。所以，没有性歧视主义的人，不会把妓女当作最可耻下贱的象征，也不会对卖淫深恶痛绝——除非她也同等地把劳工当作可耻下贱的象征或同等地对雇佣劳动深恶痛绝。对于卖淫，她因此关心的是改善其劳动条件等一般劳动问题（故而倾向卖淫合法化）。事实上，性工业的劳动者（牛郎、妓女、脱衣舞者、▷书及▷片演员、模特儿、编剧、副导、摄影……）这些性少数，正是性解放运动要号召的主体之一。

马克思及恩格斯这种反性歧视的态度，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性激进派，都是号称左派的人士应当认真学习的。「左派」人士如果能认真研习马克思主义性激进派的著作，必能在未来的性解放运动中找到施力点。毕竟作为左派，理应支持一切反压迫、反支配的运动。对于反性别压迫及性压抑的女性主义性解放运动，左派自然应当大力支持以建立社运连线，做个女人性革命的促进派（借用毛泽东语），这样方能借着串连性解放，扩大社运团结的形式，并且深化反性压迫或性压抑的内涵，以使性别及性的议题内的阶级

面向出现。

左派应先自我反省阶级运动中的性压迫

女性主义的性解放是在性别支配中指出性压迫的面向，并且在性压迫中指出性别支配的面向。「左派」若要平等地与这个运动互动，当然必须放弃其「指导」的高姿态（例如，不应该质问性解放「是怎样被提到社会改造的日程表上？」；毕竟，有压迫就有反抗，反抗性压抑当然有其初始的正当性。谁有资格去决定什么是「社会改造的日程表」呢？）。更重要的，所谓的「左派」更要检讨自己的性别歧视及性歧视。

号称「左派」者如何面对自己的性歧视主义呢？很简单，先不必以高姿态质问女性主义性解放中的「阶级」问题，而是反躬自省工人的阶级运动中的「性压迫」问题！

如果号称「左派」者去发掘阶级问题中的「性」的面向、工运中的性歧视主义，那就已经在深化性解放运动及工运，并且扩大性解放的反抗形式。

我将在下一篇文章继续批评红笔文章所表现出来的集权左派态度，我认

为这样的态度没有办法处理情欲问题，更遑论情欲问题的阶级面向了。当然，也许我可能误解了红笔在文本中呈现的立场，但是没关系，只要是真正的左派，一定会并肩为阶级正义与情欲正义共同奋斗的。

豪爽女人对于某些左派是一种挑战，也是其克服男性沙文主义及情欲沙文主义的契机。让我们期待豪爽左派的出现吧。

(1995年4月24-25日立报)

作者附注：本文第一天发表时笔名原为「虹戾」，后来因为报社方面对「戾」字有点意见，我也同意第二天起改为「虹B」，因此，下面红笔等人文章会出现「虹B」字样。现在趁文章重刊时，我将笔名改回「虹戾」。

本文在以「虹戾」为名发表的时候，即使在像立报这种边缘小报，也是一件惊世之事；由于「戾」字向来被当作不雅污秽之字，故而公开在媒体写出来，也可能被视为有侮辱他人的意含。有人或许以为我取「虹戾」笔名只是因为此二字不但在音上和「红笔」相对，也在意义上和「红笔」针锋相

对（以七彩对独红、以女屌对阳具象征的笔，以情欲的屌对知性的笔等等）。但是其实「虹」在新社会运动和同性恋酷儿运动，早成为反对阶级化约论和强调差异政治与多元情欲的象征。其次，「屌」对笔者而言，应当是个正面的、值得大量出现的字眼，而且应当融入学术的语言；这是性解放运动的一部份。一九九六年尾台湾媒体先后出现了「屌」和「屌」字眼的广告（「屌」在台湾俚语中有「顶级」、「很棒」的意思），引起许多争议。笔者在这方面的思考，请参看笔者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联合报副刊发表的〈性器官占领台湾〉（原题：让屌屌屌占领台湾）。以及笔者在「第二届性教育、性学、性别暨同性恋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1997年6月1日）讲评谢志伟教授论文时有关「用屌屌屌占领学术」的发言。